

# 十字架下绽放的玫瑰花

——论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合

张建宏

---

**内容提要:**《圣经》对艾青其人、其诗、其诗艺,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式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潜在的巨大影响。艾青与《圣经》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契合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苦难意识,2、牺牲精神,3、爱和怜悯。从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合、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与《圣经》原型、艾青诗歌的内在结构与《圣经》启示以及艾青诗歌的抒情方式与《圣经》语言等几个方面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出《圣经》对艾青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

**关键词:**艾青 《圣经》 精神遇合

**作者简介:**张建宏,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Title:** Blooming Roses under the Cross: Spiritual Fusion of Ai Qing and *the Bible*

**Abstract:** *The Bibl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Ai Qing, his poetry, his poetic art, and his unique way of experiencing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world. The spiritual fusion of Ai Qing with the Christian thought of *the Bible* is generally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second,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third, love and compassion. Through analyses of the spiritual fusion of Ai Qing and *the Bible*, the central image of Ai Qing's poetry and *the Bible*, a prototyp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i Qing's poetry and revelations of *the Bible*, as well as the lyrical way of Ai Qing's poetry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Bible*, we can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Bible* on Ai Qing is enormous and profound.

**Key words:** Ai Qing *the Bible* spiritual fusion

**Author:** Zhang Jianhong is professor at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main areas of research ar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zjh\_1122@163.com

---

《圣经》对艾青的影响是显见且深刻的。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艾青引用《圣经》或《圣经》故事的诗篇就有近十篇之多,它如在意象、典故、词语上引用或化用《圣经》的更是触目皆是,不胜枚举;更是因为《圣经》对艾青其人、其诗、其诗艺,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式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潜在的巨大影响。而这一点却是向来为研究者所忽略了。本文即是从艾青与《圣经》的联系入手,通过考察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

合,艾青诗歌的原型意象、内在结构、叙述方式等方面,探讨《圣经》在艾青整个思想发展历程和诗歌创作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起过什么作用,有过何等重要的影响,以及艾青又是怎样利用《圣经》这一思想、文化、文学资源,在自己的创作中打下深刻烙印的。

### 一、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合

艾青作品中引用《圣经》或《圣经》故事有近十篇之多:“一个拿撒勒人的死”(1933)、“病监”(1934)、“马槽”(1936)、“笑”(1937)、“火把”(1940)、“播种者——为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而作”(1940)、“给姊妹们”(1942)以及《诗人论》(1939)等。而散见于其它诗歌中的有关意象、典故、词语等更是不胜枚举,如“十字架”、“人之子”、“马槽”、“弥撒”、“祈祷”、“复活”、“新生”、“天国”、“天使”、“安息”、“伊甸园”、“荆棘的冠冕”等意象;耶稣殉难、圣母诞子等典故;直接引用或化用《圣经》词语的,如“东方是怎样红起来的”中“有信心的人是有福了”,“晨歌”中为“挟着希望的遨游者有福了”,“农夫”中写道:“你们活着开垦土地,耕犁土地,死了带着痛苦埋在土地里”,正是“生于泥土,归于泥土”之意等。许多诗歌的标题也可看出圣经的影响:“播种者”、“新的伊甸集”、“没有弥撒”、“忏悔吧,周作人”。<sup>①</sup>

众所周知,艾青诗歌创作的生涯与监狱生活是分不开的。“狱中诗”是艾青创作的第一批成果。而“狱中诗”的写作又是与《圣经》的启迪分不开的。在狱中,当局允许阅读的书籍便是《圣经》。当然,艾青接触《圣经》应当更早。在回忆巴黎生活的“古宅的拜访”一诗中,他曾写道:“……有个中世纪的巴黎/远离了喧嚣/蛰伏在《圣经》里的巴黎”。可见,早在巴黎时艾青就已很熟悉《圣经》了。但是,在监狱里读《圣经》将会引起艾青更强烈的共鸣和精神的契合则是不言而喻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艾青诗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监狱生活的冶炼、与《圣经》的滋养有关的。

监狱生活给艾青的直接馈赠首先就是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在狱中,艾青直接以《圣经》为题材创作了“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与“病监”两首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写耶稣在逾越节前夜因犹大的出卖而被彼拉多逮捕,受尽苦刑和凌辱,最终同两个强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诗歌所抒发的核心情绪是耶稣得不到他为之献身的民众的理解,甚至在受到严刑拷打后反遭民众的嘲笑。诗中耶稣因此带着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寂寞的悲哀——一种深沉的受难感。显然,艾青其时与耶稣怀有同感。试想,艾青在“一·二八”的炮火声中风尘仆仆赶回国内,原是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他一腔热血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却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他是怎样的悲愤呵!艾青后来回忆这首诗时说:“当我写到‘要救人的/如今却不能救自己了……’我流下眼泪哭了!”(周红兴 240)又说:“这首诗虽然取材于《圣经》,还是渗透了我自己的感受的”(周红兴 240)。长时间的囚禁使艾青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几乎接近死神的门槛,“我肺结核的暖花房呀,那里在150°的温度上,/从紫丁香的肺叶,/我吐出了艳凄的红花。”在“病监”中,艾青写道:“人将说,‘我们都是拥抱着/我们的痛苦的基督’/我们伸着两片红唇,/吮吸我们心中流出的脓血。”可见正是对痛苦、疾病的体验使艾青与基督教的苦难意识有了共鸣,正是以救世为己任、自愿为大众牺牲的耶稣使艾青摆脱了个人一己的悲哀,从拥抱自己的痛苦走向拥抱大众的痛苦。

由于不幸的童年和坎坷的身世,艾青能够深刻体会到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在耶稣、圣母的受难与牺牲的描述中渗入了较深的个人体验。正是因为这种契合,艾青对于耶稣、圣母的命运抱以痛感与同感。对于苦难美情有独钟。对于艾青,在后来的诗歌创作

中,基督受难的主题始终萦怀,挥之不去。例如“笑”：“我们岂不是都是/都在自己的年代里/被钉上了十字架么？/而这十字架/决不比拿撒勒人所钉的/较少痛苦。”“敌人的手/给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从刺破了的惨白的前额/淋下的深红的血点……”又如写于1936年圣诞节的“马槽”中的圣母形象：被遗弃、被指责、被唾骂，在人们“斜视的眼光”和“冰冷的笑”里生下了耶稣，“带着悲伤离开了马槽/雪花飘上了她的散发/无声地/她去了。”当然，苦难意识在艾青的笔下与基督教的苦难意识是有区别的。基督教的苦难意识指的是人的“原罪”，是“上帝的信仰”。中国文化中没有“原罪”的意识，有的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拯民于水火，解民之倒悬。受难是责任和义务的担当，是个体融入国族、集体的超越，而不是从世俗到神性的超越。因而艾青诗歌中的苦难意识就有了一种化苦难为美的力量。艾青诗歌的苦难美正是摒除了“原罪”意识，而以伟大事业的神圣感和正义性为鼓舞力量的美学升华。因此“牺牲”也有了意义，从殉道精神而生出悲剧感，从献身精神而生出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与坚信，乐观主义信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诗论》）。所以诗人在“一个拿撒勒人的死”诗前小序中引用了《新约》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约翰福音》12:24）。

由基督教的苦难意识和牺牲精神，艾青被牵引着走向基督教的“爱”和“怜悯”，或者说，正是对于劳动人民深切的爱，正是由于独特的身世，艾青与基督教的“爱”和“怜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狱中写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这种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最好注脚。在狱中，艾青由一己的苦难推而广之到普世的苦难，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经过长长的漂泊，在“一·二八”的炮火声中回到故乡，令他辛酸的是他的乳母在他回来之前已经“含泪的去了”。他拜谒了大堰河“草盖的坟墓”，又孤独地踏上流浪的道路。不久便因参与革命文艺活动而入狱。1933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想起了保姆，他以不可遏制的诗情一气呵成了这首赞美诗。关于这首诗以及大堰河的形象，人们谈得太多了。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把大堰河的形象与圣母玛丽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或许觉得这样一来会贬损艾青的思想境界。但我认为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肺腑，正是人们从大堰河的身上看到了圣母的光辉和普世的“爱”与“怜悯”。比较一下“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的大堰河和“雪花飘上了她的散发”的圣母，就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渊源。大堰河卑微、贫贱，奴隶般的贡献自己的乳汁，贡献自己的血汗，但她总是“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槽，/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她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以广阔无垠的“爱”，以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显示出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圣母被遗弃、被指责、被唾骂，经受着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诞生圣子，但众人却指着这不贞的少妇，“叱骂她就像马屎一样污秽/没有人给她拿一只血盆/或是倒一桶温水/风从泥墙的破孔发出寒冷的嘲笑/她挣扎挣扎/把头抵住了木栅”。尽管如此，圣母仍告诫圣子：“孩子呀/在伯利恒/我们将要被逐的/我们去/流浪会把你养大/今天起/你记住自己是/马槽里/一个被弃的女子的儿子/痛苦与迫害诞生了你/等你有能力了/须要用自己的眼泪/洗去众人的罪恶”（“马槽”）。这种圣母普世的“爱”与“怜悯”，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表现是把赞美诗呈给圣母般的大堰河：“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呈给大地上一

切的, /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 呈给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大堰河的形象可以说是圣母形象的预演, 与其说大堰河身上有圣母的影子, 不如说圣母身上有大堰河的投射。两者是水乳交融在一起, 形象叠合在一起, 而“我”则扮演了接受圣母教诲的耶稣的角色。正如有人所说: “最能说明艾青心目中的诗人形象的, 莫过于在他诗歌中多次出现的耶稣。这个形象有时代表受难的中华民族, 有时象征被叛卖的烈士或人类的救星, 但是更多的时候, 似乎把他看作是与吹号者一样, 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 一个对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曾小逸 486)。“爱”和“怜悯”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应合着已萌芽的阶级意识。使艾青在这首诗中, 在“生我的”父母和“养我的”乳母之间作出了鲜明的抉择。从此, 他高揭起反叛的旗帜, 反叛他的地主家庭及其所属的阶级, 反叛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 对于这不公正的世界发出愤怒的控诉和咒语。“写着给予这不公正的世界的咒语”, 既是“用自己的眼泪/洗去众人的罪恶”的实践, 也表明艾青的人道主义既有基督教人道主义因子, 又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联系的。

此外, 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对“艾青式忧郁”的形成也有着潜在的联系, 或者说正是“原罪”这一宗教情绪感染了艾青, 使他的忧郁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忧郁。艾青一出生就被父母认为是不祥物, 命里克父母; 而大堰河“把自己的女孩溺死, 专来哺育我。我觉得自己的生命, 是从另外一个孩子那里抢夺来的, 一直总是十分愧疚和痛苦。这使我很早就感染了农民的忧郁, 成了个人道主义者。”<sup>②</sup>独特的童年在艾青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人道主义的印痕, 一接触到基督教“原罪”意识便强化了他的忧郁感。艾青式忧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渗透了基督教的“原罪”感。因此, 诗歌中的殉道精神才显得如此突出。

综上所述, 艾青与《圣经》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契合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苦难意识。苦难意识形成了他的苦难美学: 其特点是既有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因素, 又带有特定时代的阶级苦、民族恨。2、牺牲精神。牺牲精神形成了他的殉道意识: 既有献祭、仪式感、悲剧感, 又有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自觉性、自豪感和乐观主义。3、爱和怜悯。爱和怜悯形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特点是既不同于基督教的神性人道主义, 又不简单等同于阶级意识的人道主义, 既有阶级性和民族性, 又有国际性和普世性。同时, 艰难困苦玉成的不仅是艾青的狱中诗, 在狱中与《圣经》的精神遇合还玉成了艾青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式: 透过黑夜瞩望光明。

艾青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式, 在他以后的创作生活中, 其波纹不断扩大, 对《圣经》资源的取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落痕迹。随着时代的发展, 艾青的思想和艺术逐渐臻于成熟, 但《圣经》潜在的影响并没有削弱, 而是以更内化的形式弥散在作品中, 烙印在他的诗歌艺术与美学中。

## 二、中心意象与《圣经》原型

艾青诗歌中直接袭用圣经中意象的有两类: 正面意象——光、天国、天使、伊甸园、新生、火、火把、复活、祈祷等; 反面意象——十字架、审判、魔鬼、荒原、罪恶、地狱、妓女等。这些意象散见于艾青的诗作中。但是, 艾青诗歌中最常用的原型意象却是圣母和圣子。考察一下圣母和耶稣基督原型在艾青诗中的变形, 对理解其基本主题将会有所发现。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概括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为: 土地与太阳。

“土地”的意象里, 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 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

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土地”的意象里还凝聚着诗人对于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556-557）。如果我们把艾青的“土地”意象由萌生、滋长、怒放的过程标示出来的话，应该说，它萌芽于“大堰河——我的保姆”，滋长于“北方”组诗，怒放于抗战爱国诗。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艾青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与坚忍。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组合。“大堰河”之所以有象征意义，是多重意象的组合，是因为在她的底色里隐隐有圣母的光影，“大堰河”与圣母叠印在一起。圣母如大地一样宽厚、仁爱、纯朴与坚忍，圣母诞下圣子，养育生命。因此可以说，“土地”意象里也隐隐凝聚着对圣母的爱与膜拜；国际主义、普世关怀也是艾青作品中歌咏的主题。

考察艾青笔下的圣母形象可以看到：首先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个忍辱受辱的形象。其次是具有普世的救赎情怀，一个博爱无私的形象。第三是圣母的化身——大堰河，一个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博爱无私、像土地一样沉默厚重的农妇形象。推而广之，引申为农民—大地母亲—土地的象征性形象。可以说在“土地”意象里叠印着圣母的原型意象，或者说叠印着与“大堰河”共生的圣母的原型意象。艾青“我爱这土地”中“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所“移”之“情”既是对抗战中多灾多难的国土的苦恋，也是对化身为地母的圣母爱的深沉的表白。“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雪花飘上了她的散发”（“马槽”）的圣母之间也不无渊源，试看“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不正是我们在许多《哀悼基督》油画中常见的画面吗？“冬天的池沼”“阴郁得像一个悲哀的老人——/佝偻在阴暗的天幕下的老人”，也是圣母的写照吧。当然，“土地”意象里不仅有“悲哀而旷达”、“辛苦而贫困”，还有抗战风云之色，有郁勃不平 and “激怒”。圣母原型只是为“土地”意象中拟人手法的运用涂抹了情绪底色。据此也可理解艾青抗战期间国际题材的诗作，这“土地”也包括“欧罗巴”、“巴黎”、“莫斯科”和“土伦”……这里的“土地”与抗战中中国的土地一样，有“原野”、“池沼”、“河流”。欧罗巴“原野上狼藉着骸骨”（“欧罗巴”）；塞纳河“无日夜的呜咽着”（“哀巴黎”）。艾青的国际主义、普世关怀一方面萌生于巴黎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与圣母普世的救赎情怀息息相关。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考察艾青的“太阳”意象，就可看出，在这“光明颂”里有着耶稣基督的光环。艾青诗中的耶稣基督形象，最突出的是献身人格和爱的人格。在艾青诗歌中，这一伟大人格常常转化为四个形象：一是受难者——“苦难神圣化”；二是殉道者——牺牲—己拯救大众；三是救星（救世主）——爱的光芒，光明的主体；四是诗人自况——诗人、歌者，取耶稣预言者、先知之意。艾青的“太阳”颂诗，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在这类意象中时时可见耶稣慈惠的光辉。“太阳”：“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陈腐的灵魂/搁弃在河畔/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春”：“年轻人的血液”与“人之子的血液”汇流在一起。“人问：春从何处来？/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两诗均隐然借耶稣死而

复生的寓意。“生命”诗中，“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平放在壁上”的姿势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姿势，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即是牺牲一己拯救大众之意。“复活的土地”中的“播种者”隐喻耶稣，“腐朽的日子/早已沉到河底，/让流水冲洗得/快要不留痕迹了”；暗喻施洗、洗礼。在另一首不太被人注意的“太阳”中，对太阳的话似乎是对耶稣基督的礼赞：“……只要你能向我们说一句话/一句从未听见却又很熟识的话/只是为了那句话我们才活着/只要你会说：凡看见我的都将会幸福/只要勤劳的汗有报偿/盲者有光/只要我们不再看见恶者的骄傲，正直人的血/只要你会以均等的光给一切的生命/我们相信这话你一定会有一天要证实……”这太阳的“一句话”与基督教教义何其相似？艾青的光明礼赞不同于其他中国诗人同类作品的地方，便是他的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隐现着耶稣的原型，且带着他独特的透过黑夜瞩望光明的思想情感方式。

我们说，艾青的思想和艺术逐渐臻于成熟后，《圣经》潜在的影响并没有削弱，而是以更内化的形式弥散在艾青的诗歌中，烙印在他的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中，即是指他对《圣经》原型的化用无痕有味地叠合在“土地”和“太阳”两大中心意象中。且看艾青“毛泽东”中的诗句：“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眶里映着人民的苦难”。艾青笔下的毛泽东突出了“历史的重载”，“忧愁”和“苦难”下意识地把毛泽东与悲天悯人的耶稣形象叠化起来，这种写法在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艾青并不是将领袖神圣化，他不是匍匐在基督脚下的教徒。他对耶稣的殉道也曾做了某种否定。在《诗论·诗论掇拾（一）》中，他说：“不对人类命运发空洞的预言，不以先知者的口吻说：‘你们都跟我来’，而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类当中，共呼吸，共悲欢，共思虑，共生死，那样才能使自己的歌成为发自人类的最真实的呼声。”诗人发现耶稣身上固然有夺目的神性光辉，但这种光芒毕竟远离人群，遥不可及。诗人找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时代真正的神：人民。而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毛泽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耶稣故事尤其是他的悲剧命运引起了民族战争里的作家们的同情和精神同构，艾青的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和‘马槽——为一个拿撒勒人诞生而作’都是表现圣子耶稣的被卖、受审和钉十字架，圣母的被遗弃，被指责，被唾骂……圣子和圣母的命运，是抗战时期的民族象征，也有诗人自己的丰富体验，诗人与耶稣基督有了高度的精神遇合”（王本朝 45-46）。

宗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教义的渗透或宗教观念的潜移默化，毋宁说是一种宗教情绪的感染，一种普遍人性中宗教向度的唤醒，更毋宁说是宗教对文学的渗透而表现出的文学无穷的心灵震撼力量。艾青对圣母和耶稣基督的文学阐释和认同主要凸显的是二者的受难人格和牺牲精神。总的来看，圣母和耶稣基督原型对艾青诗歌宗教情绪的感染主要表现出了文学无穷的心灵震撼力量，成就了艾青诗歌特有的庄严、幽深和神圣之美。

诚如谢冕所言：“作为本世纪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创作建立在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宽厚的基础上，他的诗展示出恢宏的气势和博大的胸襟”（209-210）。“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创作建立在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宽厚的基础上”，其萌芽正在于与《圣经》的精神契合，对圣母、耶稣基督原型的化用。

### 三、内在结构与《圣经》启示

《圣经》对艾青其人、其诗、其诗艺，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方

式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潜在的巨大影响。不容忽视的是,《圣经》这一内在结构在艾青的诗作中也得到了呼应。

“寻求”与“漫游”——在艾青早期诗歌里飘忽着一个浪游人的身影,“孤独地漂泊”,“自在地流浪”。在“画者的行吟”、“我的季候”、“卖艺者”、“马赛”、“路”、“向太阳”、“火把”等诗歌中可以听到诗人“寻求”与“漫游”的脚步。“画者的行吟”：“浪客”“终日无目的的走着……”“永远带着骚音”“在最古旧的石阶上/唱一支锵锵的歌,/这歌里/以溅血的震颤祈祷着:/愿这片暗绿的大地/将是一切流浪者们的王国”。“我的季候”中“往不知名的地方流浪去”的少年。“路”：“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的夜行者。他在“马赛”里写道：“我的快乐和悲哀/都同样地感到单调而又孤独/像唯一的骆驼/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寂寞地,寂寞地跨过……”诗人在流浪的途中,孜孜“寻求”着,“从采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笛”,从此,他以“我的姿态”用芦笛自矜地吹着“我的歌”。

“受难”与“复活”——在“春”、“煤的对话”、“复活的土地”、“太阳”、“他死在第二次”等诗歌中便同构着“受难”与“复活”的内结构。“春”由“血斑点点的夜间”,“经过了悠长的冬日/经过了冰雪的季节/经过了无限困乏的期待/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在神话般的夜里/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爆开了无数的蓓蕾/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煤的对话”问“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答:“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复活的土地”：“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太阳”：“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太阳向我滚来……”带来了人类之再生。艾青独特的透过黑暗瞩望黎明的思想情感方式在这一组诗歌中找到了恰当的“情绪方程式”。

“忏悔”与“新生”——最能代表“忏悔”与“新生”这一结构模式的是“火把”。诗歌15节引《新约·约翰福音》的话,“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16、17节直接用“忏悔”为标题。“火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知识青年唐尼的感人形象。写了她在火炬大游行之夜的“忏悔”与“新生”。她是一个19岁的少女,有朦胧的爱国主义思想,但她漂浮、软弱,沉浸在个人情爱的悲观中。长诗写她在“火把的洪流”里看见了个人的渺小,忏悔了自己的软弱:“假如我还有眼泪/让我为了忏悔和羞耻/而流光它吧”,“假如我不能变好起来/我愿意你用鞭子来打我/用石头来钉我!”民族革命战争的炼狱之火烧毁了她的旧的生命,而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爱国热情中吸取了新的生命之火。诗人把参加“七·七”之夜桂林火炬大游行所深切感受到的“一种东西,一种完全新的东西”通过外化的艺术形象呈现出来,也完成了自己的“忏悔”与“新生”。

“布道”与“应和”——在“布道”与“应和”问题上,基督教给中国知识分子以精神力量。它隐喻了这样一个意义:民族战争中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先知,它们应有基督教的精神和传播方式传播现世和人生的福音。艾青写于延安的诗歌中便响彻着这一声部。“黎明的通知”中“布道”的语言气势是那么庄严正肃:“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黎明”嘱托诗人“借你正直人的嘴/请带去我的消息/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太阳的话”启人心扉:“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时代”则“应和”着:“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我的心追赶着它,激烈地跳动着/像那些奔赴婚礼的新郎”。“风的歌”“带着温暖和燕子、欢快和

花朵/唱着白云的柔美的歌/为金色的阳光所护送/向初醒的大地飞奔……”“给太阳”在“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综上所述,艾青建国前的创作正是由“寻求”与“漫游”、“受难”与“复活”、“忏悔”与“新生”和“布道”与“应和”的叙事结构展示了其思想进程,演绎了其独特地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思想情感。当然,这种与《圣经》文本的巧合只是建立在心理同构的基础上的不自觉流露。

#### 四、抒情方式与《圣经》语言

“文学的《圣经》得到中国作家的认同要比它的宗教教义容易、便捷得多……”(王本朝 270)20世纪中国文学大量移植《圣经》的语言和意象,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能力和意义空间,也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意识。

打开艾青诗集,对《圣经》语言和意象的引用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艾青对《圣经》的熟悉。在频频使用这些语言意象时,《圣经》独特的话语方式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艾青的话语方式。例如《圣经》坦诚而直率的行文,自然而流畅、简洁而精炼的语言,与艾青的语言追求是不谋而合的。艾青诗的语言来自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启示:坦诚、朴素、清新、凝练,大巧若拙。艾青说:“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诗论》)。又如《圣经》语言追求象征和隐喻,而象征和隐喻也是艾青最擅长的艺术手法。他说:“象征是事物的影射;是事物间相互的借喻,是真理的暗示和譬比”(《诗论》)。当然这里有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但《圣经》资源不自觉的移植也是显见的。如“火把”中有一段“雅歌”式的语言片段,第12节“一个声音在心里响”。写唐尼寻找情人的焦灼心情与“雅歌”中同类描写何其相似乃尔。但是这些只是表层次的相似,最内在的是艾青诗歌的抒情方式也与《圣经》多有暗合。《圣经》的语言意象始终与它特定的话语方式相连,它的语言力量来自它独特的话语方式,如由祈祷、赞美、呼告而形成的书信、祈祷诗和赞美诗,由说教、对话、演讲、书信、自传而形成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

艾青在与《圣经》的精神契合中,在对《圣经》语言意象的频繁使用中,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圣经》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而内化、改造为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艾青诗作中有大量的祈祷、赞美、呼告、对话、书信的话语方式,它们频繁出现在艾青诗作中,或一首诗中出现一种话语,如“春”结尾的对话:“人问:春从何处来?/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或一首诗中出现多种话语,如“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有赞美、祈祷、哀歌、呼告和对话等话语交互使用。同时,这些话语方式并不是偶然出现在艾青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艾青诗歌中有许多诗作本身就可看作是颂歌体、哀歌体、祈祷体、呼告体的话语结构,且形成一个个话语结构系列:颂歌体系列——“太阳”、“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播种者”、“毛泽东”、“光的赞歌”等;哀歌体系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北方”、“乞丐”、“旷野”、“冬天的池沼”等;祈祷体系列——“黎明”、“复活的土地”、“太阳”(1940)、“时代”、“给太阳”、“野火”;呼告体系列——“芦笛”、“巴黎”、“我爱这土地”、“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风的歌”等;对话体——“煤的对话”;书信体——“献给乡村的诗”。

《圣经》表达的是上帝中心的神性体验,在人与上帝之间通过不断的呼告、祈祷、赞美而



达成心灵的默契和精神的应和,表现在语言方式上就有了强烈的抒情性,有了祈祷体、赞美体等抒情文体。当然,艾青在运用这类话语方式、话语结构和抒情文体时,所表达的不是“神性体验”,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崇高情感体验。在艾青诗作里,《圣经》语言运思所具有的神秘性意义被淡化了,语言的现实性意义则被增强了。读者从中读到的颂歌、赞美、祈祷、呼告都是献给人民与人民领袖、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抒发献身于伟大时代的崇高情感。同时毋庸置疑,这类与《圣经》语言同构的话语方式、话语结构和抒情文体,成就了艾青诗歌语言庄严、幽邃和神圣之美。

以上我们从艾青与《圣经》的精神遇合、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与《圣经》原型、艾青诗歌的内在结构与《圣经》启示以及艾青诗歌的抒情方式与《圣经》语言等几个方面透析了《圣经》对艾青的影响。综上所述,《圣经》对艾青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艾青的思想情感方式,影响了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内在结构、话语方式与抒情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艾青诗歌就是一束绽放在“十字架下的玫瑰花”。

### 注解【Notes】

①本文所引艾青诗歌、诗论均出自《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以下只注出所引随文篇名,不再一一说明。

②艾青1982年7月26日上午在北京北纬饭店与周红兴的谈话,引自周红兴:《艾青的跋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7年。

[*The Bible*. Nanjing: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1997.]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Qian Liqun, Wen Rumin and Wu Fuhui. *Three Decad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1998.]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Wang Benchao.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 Culture*.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1.]

谢冕:《世纪的留言》。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Xie Mian. *Reflections on the Century*. Bei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Zeng Xiaoyi, ed. *Towards World Literature: Chinese Writers and Foreign Literature*.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

[Zhou Hongxing. *Ai Qing: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1.]

责任编辑:邹岳奇